



李新农 著

5.2
5

书生革命
usheng
geming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K825.2
125

李新农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shu shong
geng ming
译 放 年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生革命 / 李新农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3
ISBN 7-5065-4426-1

I. 书... II. 李... III. 李新农回忆录
IV. 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7048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5.25

字数: 18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7.00 元

写在父亲回忆录出版前的话

(代序)

我的父亲李新农（原名李受天）去世已近 20 年了。

1998 年我退休后，赋闲在家，时间宽裕。一日，母亲骆行把一沓发黄的旧稿纸放在我手里，说这是她保留的父亲生前未写完的回忆录，要我整理。捧着父亲的心血之作，沉甸甸的，如同捧着父亲的往日岁月，如同捧着父亲仍在跃动着的生命。

我于 1936 年底在北平出生，1937 年“七七事变”时父亲就离家抗日。1949 年他回北京时我已上了中学。中学毕业后赴前苏联留学，回国后分在外地工作，所以，我与父亲在一起的生活时间极短，对他过去的历史知之甚少。人入老年，阅读他的遗稿，使我觉得在与父亲一同穿越时间隧道，渐渐感觉他不再是一个严父，而像我的一位朋友，他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都令我感同身受。父亲 1927 年赴日留学，与好友阮慕韩、陈凤桐一起学习、研究马列主义。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愤然回国，参加反日斗争。1935 年跟随中共党员杨秀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 年“七七事变”后，受中共党员申伯纯之邀，赴国民党军鹿钟麟部进行抗日统战工作，1939 年调太行山八路军第 129 师师部，在刘伯承师长亲自领导下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1945 年 8 月调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任交际处长。1947 年与钱信忠、刘和乙创办晋冀鲁豫军区医学院。全国解放初期曾任第三军医大学副校长、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等职。算来，父亲也是个“老革

命”了。但无论他参加革命有多么早，还是担任过什么职务，我总觉得父亲终究还是个书生。比如，他报国无门时，心情苦闷，曾自责是“戴着手套坐在沙发上高谈革命的罗亭”，而在北平街头听到小贩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时则阴霾顿扫，兴奋不已。又比如，在国民党第27军舌战群儒，占得上风时，吟诗作赋，不无得意。甚至，他老人家在躲避敌人扫荡中还不忘欣赏水断村的自然美景……这一幕幕都反映了他知识分子的可爱天性和不变本色。

我很后悔在父亲生前没有和他很好地交流、沟通。在他身后只有一点点地认真辨认字迹，把他的足迹一段一段地录入计算机，并打印出来，给兄弟姐妹和家人阅读，以助怀想，留作纪念，仅此而已。但不久前，我家的世交朋友李钢看到了我父亲回忆录的打印稿，抱走了一份。他虽说是个军人，却以治史的态度，极其认真地披阅数遍，对文稿中的每一个事件都作了考证与校对，还对提及的重要人物尽可能地加了注释。他说，老人家的遗稿很珍贵，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见证，能出版是对革命前辈最好的纪念。李钢的认真态度使我很受感动。后来我又遇到了阮慕韩之子阮崇德，他正在撰写他父亲的传记，收集了很多历史照片，正要我帮助在其中指认我的父亲。并且他告诉我，当年他父亲被捕，母亲忙于营救，我父亲曾把他抱到自己的诊所照看，使他免受饥寒之苦。后来，阮崇德送给我3张照片，很老很老了，当然，那上面都有我的父亲。

只可惜由于父亲病故较早，他的回忆录只写到1949年就戛然而止。翻看他生前的日记，知道他是从1981年7月就开始撰写回忆录，而且有一个十分可观的规划。他在1981年7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挤出时间写我的回忆录，主要是想把我的经历的一些关键的历史事件和经验教训留下来，雪泥鸿爪，意在‘留痕’，共设计了14个题目（不想用连续法一揽子地写），根据

童年、青年、抗战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建国后、改行外贸和十年动乱，不同时期中各选一二个值得记忆的内容分别撰写的。每个题目都自可独立，但总的反映了我一生主要经历。这样设计难免有断续、残缺之感。眼看我已年过古稀，并且病魔缠身，深感‘病衰方知来日少’，须提起笔来写下去，能写多少就多少。虽属一鳞半爪，但也在所不惜了。”

父亲终归没有抢过时间，只来得及给我们留下了9个题目的完成稿。所以他的回忆录只能到此为止。为了聊做补充，我又整理出他的十几篇有关回忆历史内容的日记，还有趣闻轶事和少量的诗词。这些凝结着父亲满腔心血的文字，既表达了他对革命拳拳之心、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也反映了他对与其共同生活战斗的老首长、老战友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

父亲去世后，他的老战友雷任民、林一、柴成文、赵勇田合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登载在1983年5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此外，还有父亲生前10多篇日记摘抄及我母亲骆行及几位亲友所写纪念的短文，也一并收录于此。

父亲在太行时期的老战友钱信忠、柴成文虽年事已高，但均认真审阅了我父亲回忆录初稿，对文中史实提出了宝贵意见，并且还为回忆录题了词。另外，这本回忆录的整理还得到了父亲在太行时期的老战友张文进之女张宇、江涛之女江和平、郝苏之子郝在今和军旅作家海波、总装政治部蹇青松等同志的帮助和指点。如果父亲的回忆录真能汇入我国革命历史资料的海洋，我想，主要应该感谢朋友们为之做出的一切努力。

李 昆

2003年2月12日

目 录

写在父亲回忆录出版前的话 [1]

第1章 摆脱封建家庭

1. 枪炮声中的北京 [1]
2. 家中的暴君 [2]
3. 留学日本 [4]

第2章 黑夜求索

4. 慕韩、凤桐对我的启蒙 [7]
5. 中国留学生的“反日大会” [10]
6. 面对人生的十字路口 [12]
7. 营救好友阮慕韩 [15]

第3章 投身抗日

8. 走出小诊所 [19]

- 9. 救护抗日伤员 [24]
- 10. 南下寻找抗日道路 [26]
- 11. 鹿钟麟的“客卿”秘书 [27]
- 12. 初见周恩来 [29]
- 13. 鹿钟麟部的宣传科长 [31]
- 14. 北上南宫 [33]

第4章 特殊任务

- 15. 当刘伯承师长的参议 [37]
- 16. 争取国民党师长范子侠
起义 [39]
- 17. 与国民党军长范汉杰
谈判 [44]
- 18. 在太南开展日军情报
工作 [53]

第5章 献身人民医疗事业

- 19. 从大军区交际处到医学院 [65]
- 20. 筹建我军第一所现代化
医院 [73]

李新农日记摘抄

1975 年 12 月 6 日

三住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82]

1976 年 5 月 29 日

一段惊险的经历 [85]

1976 年 6 月 6 日

“虎穴”探密 [88]

1976 年 7 月 7 日

山影歌 [89]

1976 年 11 月 27 日

书生开会 [90]

1976 年 12 月 9 日

暴风雪中 [93]

1977 年 2 月 6 日

从《豹子湾战斗》联想到吃野菜 [95]

1977 年 3 月 17 日

当了两个月的俘虏收容所长 [97]

1977 年 3 月 27 日

三过虹霓村 [102]

1977年6月19日

割麦 [105]

1979年2月28日

访刘帅 [106]

1979年10月10日

谈干部子弟的“优越感” [108]

1980年6月27日

哀挽马乃庶长联 [111]

1980年12月5日

回忆太行情报工作 [112]

1982年9月28日

60年前的射击冠军吴向忠 [116]

附文：

怀念李新农，一个老知识分子的

足迹 [119]

悼新农 [124]

父亲讲过的一段故事 [128]

思念亲人 缅怀先烈 [130]

难忘的关怀	[134]
鸿儒笑谈化春雨	[137]
我生命中的灯塔	[141]
关于作者	[144]

日本军舰炮击天津大沽口，反对参加缔结“辛丑条约”的日、美、英等8国干涉中国内政。游行队伍从天安门走向铁狮子胡同1号执政府门前请愿时，段祺瑞竟下令军警开枪，当场打死群众47人，伤了100余人。后来的枪声便成了家常便饭，城里没有打，城外却打得热闹。张作霖的奉军开进北京，满街都是兵，我家住的厂桥旌勇里胡同也常被奉军骚扰，北京的老百姓都恨奉军。从1926年8月到1928年春，北京一直被张大帅的兵管着，后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联合北伐，奉军才退出了北京。从我出生到北洋军阀被推翻、北京暂时失去“首都”的徽号，北京人一直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过日子。当时的北京只要一听见枪炮响，就关城门，东西就涨价，而且还买不到。

2. 家中的暴君

我父亲李效朋生于1885年，民国初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是我国废除科举制度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那时候大学生真是凤毛麟角。我父亲之所以能上大学，是因为我祖母很年轻就守了寡，没儿子，长期受家族欺凌，她过继了我父亲，咬牙把她自己的土地卖了，下决心培养父亲上大学，图个子贵母荣。所以解放后划成分时，我们家虽然被划成小地主，但实际上从我生下来家里就没有了土地。朋友们戏称我家是没有土地的地主。

由于父亲是个大学生，毕业后被选了个河北省的省议员。作为同盟会会员，他于辛亥革命后任北洋政府秘书长、国会议员。旧国会解散后，父亲又被选为国会议员。两年后，直奉战争替曹锟和吴佩孚创造了胜利的条件，他们需要自己的国会，父亲那届国会便又被解散了。从此父亲成了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人。说也奇怪，没有固定职业并不是失业，随着政局的变化，新上台者总需要一批人为他们捧场，父亲也就在动荡中浮浮沉沉。

今天是这一派力量的参议，过些天，又被另一派力量聘为顾问，没有任何实权，只是混些“车马费”维持生活。政局变化越多，父亲的职业变化越频繁，时间一长，父亲也就变成了一个很适应这种环境的“政客”。直到北伐，北洋政府的各派力量都垮了台，父亲才不再为人所用离开了政坛。1928年北京失去首都地位后，父亲的活动能量大为减少。直到政府迁至南京两年后即1930年，国民党为笼络人心，指定每省推荐两名过去曾任过议员、有一定“声望”的人，到国民政府文官处任“文官”（名义是咨询，实际是白职），我父亲又到了南京，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手下任政府文官处参事。日本军队占领北平时，他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在家赋闲靠变卖家产为生。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政府聘任为中将高级参议，于1946年病故。

北洋政府垮台后，父亲没有了职务，但是由于他尽力适应，我家还是维持了小康水平，并保证了子女（我和一姐两妹）按部就班地上学。但也正由于父亲是旧政府的一个政客，他除了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没有任何信仰，性格是扭曲的。在外边由于政局变动，备受挫折，家里的人，特别是孩子就成了他发泄不满的牺牲品，动辄斥骂，继之以打，家庭生活没有丝毫温暖。在家里他是一个暴君。记得有一年北京刚兴电车，老百姓们趋之若鹜，而我们家的孩子在父亲威严的家规统治下，非但不敢去看，更别提去乘坐了，只是不断听别人大谈特谈那电车如何神奇。有一天，我和姐姐的好奇心终于战胜了对父亲的恐惧，偷偷找到电车，爬了上去，并从西单到天桥坐了一个来回。因为回家稍晚，被父亲发现，他勃然大怒，把我们姐弟俩狠狠揍了一顿。还有一次，我因为胃不好不愿吃羊肉（一闻到膻味就想吐），他不但打了我，而且不准我吃饭，罚我跪在饭桌前看着别人吃。尽管为了逼我吃羊肉，父亲不止一次地打、罚，可是至今也没有扭转我不吃羊肉的习惯。

在这样的家庭里，我的童年很少有乐趣可言，每天从学校回来，就躲在自己屋里悄悄找小说看。上中学以后，我遇到几位好老师，对我影响很大。罗常培老师是我人生历程中第一个最值得感激的人。他接受“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身体力行地提倡新文化和新的教育思想，一摒封建意识和旧八股的文风，把我们这些苦遭禁锢的学生从故纸堆里搭救出来，使我们呼吸到时代的新鲜空气。他改革作文课的教法，反对过去那种就书论书的老顽固，主张自主选题，提倡文章要有新意。他还介绍和辅导我们读鲁迅的书。令久旱的禾苗吸吮甘露般的革命营养。他调走后，他的好友黄鲁庵继任，黄也和他一样，提倡读新书，接受新思想，那些日子，我真有日新月异的感觉。有一次，黄老师让我们选择自己认为最值得记述的一件事为题作文，我就写了一篇《家中的暴君》，痛痛快快地倾吐了一番在家中感受的苦闷，并愤慨地问了一句“为什么‘五四运动’过去这么多年了，我的家怎么还是暴君统治呢？”这篇文章受到黄老师极大赞赏，说我问题提得好，还让全班传着看。就是从那时起，我对文学喜爱起来，而且逐渐告别了“七剑八侠”“大小五义”等旧武侠小说，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和杂志，开始了我的“离经叛道”之旅。

3. 留学日本

随着成长，我与父亲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我几乎天天都在琢磨怎样才能远离这个封建家庭。1927年中学毕业时，正好父亲有个姓陈的老友的儿子留学回国，来我家时，讲在日本上学和在国内花钱是一样的，但学的东西多，回来还容易找职业，而且赴日留学的手续也相当容易。当时，比我高几班的中学校友也有好几个在日本，他们都热情地召唤我，甚至表示愿意为我提供经济援助。我的几个在沈阳日本人办的大学学医的堂兄和姐夫，也力

主我到日本去学医。加之二妹少年病故，父亲感到学医似乎有用处，特别是他认为医生不受政治变动影响，是个“铁饭碗”。就这样，在亲友们的夹击下，父亲同意送我赴日留学，条件是必须学医。我自己并不喜欢那个穿白大褂的行当，但离家有望，也就接受了这个条件。这是我青年时代的一个转折。离开封建家庭，到海那边去自由呼吸，对我一生起了决定性作用。去日本时，我不过17岁，头一次出远门，毫无涉世经验，根本不懂得天南海北人情世故，但路上有了堂兄们给我找的同伴，靠岸后又有先期赴日的同学接应，帮助安顿一切，经过相当顺利。

补习了半年日语，18岁时考上了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第二年又考上了庚子赔款的官费名额），因为我只有中学毕业的学历，只能考医学专门部4年（日本大学6年）。那时中国在日本上学的有1000多人，我开始住在中国青年会，那是留日学生的活动中心。后来为了锻炼语言能力，又搬到大岗山，并完全独立生活。我觉得在日本学习并不太难，开始听课虽然较费劲，但课后借日本同学的笔记补一补，不理解的请教请教，慢慢也就过关了。1年后，我认识了河南内乡人陈凤桐^①，接着又认识了河北同乡阮慕韩^②，他们都比我大十来岁，但很谈得来，同为异乡异客，很快便成了“忘年交”。凤桐是饱经忧患的老大哥，人极热情、正派，在日本东京青山大学学农业经济。阮慕韩原名阮铭琦，河北省怀安县人，在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学法律。陈凤桐建议我们3人住在一起，共同租一小楼，合伙做饭。我认为这意见很好，既节约，又可多向两位老大哥学习，当时很多日本学生也都这样做。于是，我们3人便在日本东京的东中街找了一栋小楼租下来（一共4小间房子）。日本交通方便，各自上学都不算太远，最大的好处是环境幽静，晚上有利学习，这样3人便组成了一个小家庭。租了房子要有户主，因为我最年轻，他们说我的日语比较流利，便于周旋，一定要我当户主，我也只好同意，并兼管家

工作（请了一位日本老太太买菜做饭，由我做菜管账），但不愿用我的名字去登记户口，经讨论，陈凤桐是河南内乡人，内乡属南阳，出过诸葛亮，有个龙岗山，我们又是3人，所以接受了我的提议叫“龙岗三雄”，日本人也有“龙岗”此姓，从此，我便成了东京东中野文园24号的户主，周围邻居和菜店都称我为“龙岗先生”。

第2章 黑夜求索

4. 慕韩、凤桐对我的启蒙

在“龙岗三雄”中我的年龄最小，陈凤桐和阮慕韩都是我的老大哥，也是我学习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慕韩 1924 年就到了日本。他学习刻苦，办事认真负责，作风朴实，文学、法学功底都很深。对真理的追求十分执著，研究马列主义时间也比较长。在日本他曾发起组织了一个“业余社会主义科学学习会”，联合了我们七八个思想进步的同学，利用业余时间，经常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我当时年龄比他们小，也很幼稚，犹如一张白纸，因为中学受老师的影响，特别对封建家庭不满，所以从思想、观点方面很容易与慕韩、凤桐沟通，他们对我十分爱护，经常指导、帮助我。最初我在“业余社会主义科学学习会”也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如《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这些书在日本是公开出售的，日本许多有名的出版社专门出版与社会主义有关的书籍），但是并不太懂，一方面由于功课较忙，另一方面钻研得也不够。后来和“学习会”的同学一起讨论，却很有帮助。记得有一次讨论，不是按自己学的内容提问题，而是根据国内外